

教学参考资料

“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

(重要事件的平反和拨乱反正)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

一九八五年三月

说 明

为了配合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广泛收集报刊资料的基础上，选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重要事件的平反和拨乱反正），由于这方面材料较多，限于篇幅，只能选其中全国有影响的重要事件及人物。为查找方便，并附资料索引。

本资料由董莲馥负责选材、编辑、董莲馥、杨宁一校对，并经我室付主任罗平审定。

选编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一)

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前前后后……	(1)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兼驳《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1)
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23)
书生本色 太史奇冤——《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	(28)

(二)

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	(30)
“旧文化部”大错案彻底平反……	(32)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	(33)

(三)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36)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彭真案……	(36)
罗瑞卿案……	(36)
陆定一案……	(37)
杨尚昆案及中央办公厅问题……	(37)
在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的悼词……	(38)
铁骨忠魂——罗瑞卿同志遭受林、江反革命集团陷害纪实……	(40)
罗瑞卿同志革命生涯的最后岁月……	(43)
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	(46)

(四)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49)
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49)
为两簇傲霜怒放的鲜花洗雪——驳姚文元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诬陷……	(55)
“三家村”冤案的教训……	(56)

(五)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58)
----------------------	--------

党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推倒强加给贺龙等同志和全国体育系统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60)
周总理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61)
为贺龙同志平反·····	(61)
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	(64)
“二月兵变”真相·····	(76)
元帅之死——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	(77)

(六)

党中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81)
实事求是的新胜利·····	(82)

(七)

在彭德怀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86)
赤子之心——怀念彭德怀同志·····	(87)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95)
彭总之死·····	(101)
泪水沾湿的回忆·····	(103)

(八)

陈云同志在陶铸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109)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110)
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	(115)
乌云难遮亮节高风·····	(121)
陶铸同志被打下台的真相·····	(128)

(九)

为“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平反·····	(134)
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134)
胡耀邦同志在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137)
我的一段经历·····	(139)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141)
春风奏凯扬征帆·····	(149)

(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53)
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	(161)
篡改历史进行政治陷害的典型——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164)
点火北大、祸及全国——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目的·····	(197)

揭开帷幕 抓出元凶——“打倒刘邓”的反革命口号是怎样出笼的？	(171)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74)
江青康生陷害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大阴谋	(179)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181)
王光美同志及其兄妹参加革命的前后经过	(204)
从最大的冤案中记取沉痛教训——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209)

(十一)

为“总政阎王殿”平反	(212)
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和“四人帮”打总政闷棍	(212)

(十二)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	(216)
“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	(217)
青松挺且直	(228)
霜重色愈浓 斗争见英雄	(232)

(十三)

党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238)
为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冤案遭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239)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240)
余立金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243)

(十四)

贺诚冤案平反前后	(244)
为傅连璋同志恢复名誉	(247)
傅连璋之死	(248)

(十五)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及请示报告	(252)
邓子恢同志与农业生产责任制	(255)
深切怀念邓子恢同志	(261)

(十六)

为瞿秋白、李达、杨献珍平反	(294)
重新评价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	(265)
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	(267)
瞿秋白的被捕和就义	(270)

李达同志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276)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	(277)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	(279)
一九五九年纪事.....	(281)

(十七)

清华大学党委纠正所谓刘冰等人写“诬告信”的错案.....	(287)
------------------------------	-------

(十八)

广东省委、省革委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的事件.....	(289)
彭湃的光辉一生不容诋毁.....	(291)
烈士英名与世长存——缅怀彭湃同志,痛斥林彪、“四人帮”陷害彭湃烈士一家的罪行.....	(297)

(十九)

所谓“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302)
“九一三”事件后的周恩来同志.....	(306)
迫害开国元勋罪责难逃——清算林、江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朱德同志的罪行.....	(308)
藏稿记[注:记张闻天同志].....	(311)
“四人帮”是怎样残酷迫害曹荻秋同志的.....	(313)
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	(318)
悼念田家英同志——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附肖韵:请读这篇 别具风格的悼词).....	(323)

附 录

资料索引.....	(327)
-----------	-------

专题（一）

震动全国的大冤案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黑文出笼前前后后

高 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策划下，反动文痞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制造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大冤案。这是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此以后，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宣判了“死刑”；作者吴晗同志惨遭迫害，家破人亡，有的演员也含冤而死；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学术理论界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株连和残酷打击；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现在是彻底揭露和清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反革命破坏阴谋的时候了！

现在是彻底打破“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我中华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一）

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是叛徒江青一手策划的阴谋。

事情得从一九五九年讲起。

原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同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提倡学习“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九月，又写了《论海瑞》。在这些文章中，吴晗同志根据大量确凿的史料，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阐明了海瑞这个历史人物生平的主要事迹和值得称颂的一些品质，认为海瑞那种敢讲真话，敢于反贪官污吏，敢于为人民做好事，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与此同时，上海和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宣传海瑞精神的戏剧，如《海瑞上疏》、《海瑞背纤》、《三女抢板》等等，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据统计，仅上海一地，这一年上演的有关海瑞的戏剧就达十八种。当时，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同志在政协会上遇见吴晗同志，要求他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海瑞戏。吴晗同志欣然允诺，经过七易其稿，边写边排，边排边改，历时一年左右，终于完成了这出历史剧的创作。剧本原名《海瑞》。后来有同志提出，全国写海瑞的戏有好几个，而且这个剧本并不是写的海瑞一生，为了区别，建议加上“罢官”两字。吴晗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改名为《海瑞罢官》。可是，这出宣传“海瑞精神”的历史剧，后来竟被“四人帮”说成有意“影射”庐山会议，打成了“反党大毒草”，这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

历史剧《海瑞罢官》，用艺术的手段，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剧情通过农妇洪阿兰一家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明王朝末期尖锐的阶级矛盾，描绘了海瑞一五六九年夏至一五七〇年春任应天（江南）巡抚时敢于除霸、逼令缙绅退田等感人事迹，塑造了为封建时代广大人民所称

颂的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官吏最后落得罢官的必然命运。尽管这出戏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不够完美之处，但从四年多的演出情况来看，曾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认为《海瑞罢官》有几个场面写得相当吸引人，是一出比较成功的历史剧。

谁能料到，正当广大观众热情称赞、提出建议，希望这出历史剧尽善臻美的时候，它却遭到了叛徒江青的忌恨，一场不可告人的阴谋早就在黑暗的角落里策划着，弥天大祸行将降临到首次创作历史剧的吴晗同志头上。

叛徒江青一贯扯大旗作虎皮，“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江青、陈伯达一伙插手炮制的一个文件中，煞有介事地说：“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

事实真是这样吗？否！

早在一九六二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全盘否定了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战线的成就。江青的反动观点，遭到了正副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江青进行所谓“调查研究”和“艺术实践”，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恼火，“感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于是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一九六四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会演，开始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同年下半年，江青就要北京一位同志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未成。于是到上海同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进一步合伙策划，决定由反动文痞姚文元执笔。

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着手炮制初稿，历时十一个多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其间张春桥还亲自动手，作了修改，于十一月十日悍然抛了出来。

从上列粗略的时间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批判《海瑞罢官》”，根本不是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准备的，而是早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京剧会演以前，江青就背着毛主席，暗中进行阴谋策划了。这里还可以用江青的自供来作证：在京剧会演以前，“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对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尽管江青惯于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话，在这里她也不能不供述一些真情，承认自己关于历史界的看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但是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观点，亲手策划了攻击《海瑞罢官》、陷害吴晗同志的文章。

江青说过，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姚文元也说过“那我就豁出去了”。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写一篇“文艺评论”文章，“讨论”一出戏，又有江青亲自“挂帅”，为什么竟如此鬼鬼祟祟、诚惶诚恐，准备“孤注一掷”呢？原来他们搞的是反革命政治阴谋，所以“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京沪道上，“保密了七、八个月”。那么，究竟对谁保密呢？现在一查，情况就清楚了。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对党中央保密，特别是对周总理保密。文章抛出之前，叛徒江青曾恶狠狠地说，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后来，周总理看到载有这一问题讨论反映的《文汇报》时，张春桥十分惊慌，马上命令改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每期限印十二份，直送张春桥，由他控制分发，继续对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封锁消息。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搞

阴谋诡计吗？这难道不是江青乘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机，从“海罢”问题上开刀，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妄图改朝换代的罪恶行径吗？

(二)

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领域内，在艺术问题上，可以而且必须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以达到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目的。人们如果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提出来，完全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探讨，通过批评和反批评，逐步求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即使暂时不能一致，也可以保留意见。毛泽东同志在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特别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广大读者起初正是本着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抱着这样的心情去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但是读了之后，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姚文元的黑文，根本不是进行什么学术讨论，而是首先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从政治上把它宣判了“死刑”。怪不得当时广大读者惊呼：“姚文写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进到了政治领域，叫人害怕！”有的读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姚文元有意识地在文章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企图用政治问题的帽子，在精神上给对方以一种压力，从而达到自己先胜一筹的目的。”十七岁的中学生马捷在来稿中揭露说：姚文“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姚文元的这篇奇文，看看他是怎样无中生有地把反革命棍子打到吴晗同志身上的。

姚文共分四大部分，长达万言，谬论横生，不必一一细驳，就其主要“论点”剖析一番，即可见其罪恶用心。

首先，姚文在“《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节内，歪曲吴晗同志的原意，武断地硬说“《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明明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言和剧情中，对海瑞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难道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吗？吴晗同志什么时候讲过海瑞是“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什么时候讲过海瑞是“农民利益的代表”？没有，纯粹是姚文元自己的“歪曲、臆造”（这是姚文元诬陷吴晗同志之词，还给他自己倒是满合适的）。列宁说过，修正主义者总是“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姚文元采用的正是这种卑劣的手法，在封建时代的官吏中，确有包拯、海瑞这样的人物，既是封建皇帝的忠臣，又比较接近人民群众，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人民因此称颂他们；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表现出来的也仅仅是这一点，而不是描写海瑞如何转变阶级立场，变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姚文元却把剧情中所反映的海瑞做一点好事，就说成是“决定农民命运”，“美化了地主阶级”，因而对吴晗同志横加责难和挞伐。这难道不是无中生有、蓄意陷害吗？

紧接着，姚文元为了证明自己“歪曲、臆造”得有根有据，在“一个假海瑞”、“《海

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两节内，他居心叵测地篡改了明史。这个自供“不是历史学家”的反动文痞，反诬吴晗同志“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事实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除霸”、“退田”、“修吴淞江”等主要史实，都早已明载典籍，有目共睹。当然，历史剧是文艺作品，允许艺术加工，虚构个别人物和情节。如果吴晗同志在对海瑞形象的艺术处理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当然是可以讨论商榷的。可是不，姚文元说，不是谈这些细小末节，而是要查考基本的历史事实。按照他的“查考”，除霸，平冤狱，“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没有一个知府、知县“被杀、被革”；退田，“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即使退，也“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修吴淞江，姚文元承认“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怀疑的根据呢？姚文元说，“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经姚文元这样“想一想”，海瑞主持整修的一段吴淞江就被否定了。但是，历史的事实怎么能单凭姚文元那样“想一想”就改变得了呢？当然不会。姚文元在这篇黑文中对史料的歪曲和篡改，连当时他所操纵的“罗思鼎”写作组也认为“太出洋相”了，于是不得不连续发表所谓评“投献”、“退田”、“告状”等文章，企图“弥补”漏洞，当然，欲盖弥彰，只能说说假话，打打圆场而已。而当时广大读者一眼就看穿姚文元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纷纷来稿来信，据史驳斥。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郝景衡在《试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中，驳斥了姚文元否定除霸的谬论，指出：“李卓吾不是说过吗：‘（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并引史论证，海瑞只作了七个月的应天巡抚，“已经做到‘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连苏州织造太监也为之减其舆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指出：姚文说“退田”是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理论根据”是当时土地兼并靠中小地主投献。事实上，贫农、中农也有被大地主兼并的，说“退田”完全是退给中小地主、富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海瑞做了些对人民有利的事，这是历史事实。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魏建猷在座谈会上也说：“退田问题，姚文根据一条史料就说退的是投献部分的田，但有很多材料说明退田不限于退投献田，另一种用强力侵夺的田也要退，这里面就有农民的田。”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家驹在文章中指出：“海瑞领导修筑吴淞江，系自黄渡至黄浦江口一段，全长约七、八十里，……事实上也是完成了的。根据海瑞《处补练兵银疏》等文献，海瑞不但按原计划修治了吴淞江，还利用修吴淞江余款来开浚了白茆河。……何良俊这样记载：‘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海瑞）开吴淞江之力也。’这次开工是正月初三动工，二月二十日完成的。”

请看，“不惜改写历史”的，不恰恰是姚文元自己吗？他为了诬陷吴晗同志，不惜把四百年前的历史来一个大胆“怀疑”，彻底“否定”，从而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等大帽子，一顶顶地硬扣到吴晗同志的头上。这难道不是无中生有、蓄意陷害吗？

要害还在姚文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真是“图穷匕见”。姚文元在胡乱编造一通历史资料后，粗暴地给《海瑞罢官》及其作者下政治结论，封住别人的嘴。在这最后一节内，他接二连三、别有用心地提出“学习‘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学习“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真男子”精神吗？明明吴晗同志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而是指出今天宣传海瑞，是为了给海瑞做一个历史的正确的评价，是发扬他的刚直

不阿，敢于反对坏人坏事的精神。吴晗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公开申明：“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他指出：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上，要为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要反对官僚主义，要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可是，姚文元却对此一概视而不见，而凭空捏造出吴晗要人们“学退田”，并且秃笔一转，竟然联系到一九六一年国内某些地方出现的“单干风”，胡说吴晗同志要大家向人民公社“退田”，为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鸣冤”，“平冤狱”，鼓动他们起来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作“斗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帽子、大棒子就是这样劈头盖脑地飞向吴晗同志。事实上，吴晗同志的《论海瑞》发表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则是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写的，怎么可能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就会“影射”到一九六一年的现状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健教授当时就仗义执言：“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也愤怒地指出：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

欲知什么叫“影射史学”吗，姚文元的黑文就是绝妙的“样板”。欲知什么叫“笔杆子杀人”吗，姚文元就是凶恶的“标兵”。

退一万步说，即使《海瑞罢官》是错误的作品吧，也不应该“因言废人”，把作者一棍子打死，全面否定吴晗同志，何况它是一出提倡“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比较好的历史剧呢。可是，姚文元不仅横蛮地对吴晗同志下了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而且气势汹汹地写道：“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看，这是何等的强横霸道、咄咄逼人！就是说，我姚文元打倒了你，你只能回答“打得对”，否则就“罪加一等”！天底下有这样的“学术讨论”、“文艺评论”吗？没有，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伙反革命才惯用这种凶暴手段。它不能不激起广大读者的义愤。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当时为此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请听，这是多么正直的声音啊！有的读者激于姚文元的强暴行径，斩钉截铁地写道：“我们是要为吴晗同志辩护到底的，我们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这正是广大读者对姚文元的明确回答和严正批判。

(三)

姚文元在这篇黑文的末尾说：“需要加以讨论”。明明已经下了“毒草”的政治结论，还要讨论什么？原来，给《海瑞罢官》和吴晗同志下政治结论，仅仅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阴谋的开始。他们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革命旗号，由江青在幕后操纵，张春桥亲自指挥，姚文元赤膊上阵，利用《文汇报》这块舆论阵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人们是不会轻信姚文元的鬼话的。所以黑文出笼之后，应者寥寥。在二十天内，报社仅

仅收到三篇来稿，其中一篇全面地批驳了姚文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象姚文元那样给人下了政治结论，是无法开展讨论的。眼看不成气候，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地要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读者来信”，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抛了出来。张春桥特意加了《编者按》，说什么“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仅仅是按照张春桥自己的意图，组织了四封来信，哪里有“许多同志来信”？明明是张春桥自己的“建议”，哪里有群众的要求？张春桥就是这样惯于强奸民意，耍弄阴谋诡计的！

更有甚者，张春桥在《编者按》中亲自写了这样一段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为了扩大影响，张春桥指令这个《编者按》要连续刊登六天。这在报刊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又是“各抒己见”，又是“热烈欢迎”，说得何等“亲切”，何等“动人”，好象他们真的要造成“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

紧接着，张春桥指令文汇报从十二月七日起，重新发表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其他有关的一系列旧作，他亲自改定的《编者按》中又继续高喊：“本报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发表读者的来稿来信，进行充分讨论。”并且再一次规定这个《编者按》也要连续刊登六天。“充分讨论”的气氛被他们制造得何等“热烈”啊！

可是，善良的人们怎能意料得到，就在这一片“欢迎热烈讨论”的烟幕之下，暗藏着张春桥一伙反革命的阵阵杀机。

原来，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夕，张春桥就指令文汇报在文章刊登后，要尽快地收集京沪两地各界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人士的情况反应，密切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就是说，姚文元的黑文尚未发表，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已落到了江青、张春桥的盘算之中，一场反革命的浩劫行将临头。姚文一发表，张春桥立刻指令报社每天要编发大量情况，不要说分发的对象，就连情况的编排，字号的大小，都要由他决定。他甚至在情况的送审稿上批定了印刷的式样和时间。江青、张春桥他们看了情况后进一步策划，亲自下令报社要去摸某单位、某人的情况和态度。并且一再规定“情况是绝密的”，“谁泄密，要追查”，完全是一套见不得人的阴谋手法。

在高唱“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同时，姚文元亲手制定了全面诬陷、打击吴晗同志的“选题计划”。第一次，他拟了十八道选题，什么《为谁服务，对谁有利？》、什么《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药》，什么《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鸦片》，等等。姚文元还在选题下注明：批判时要“用吴晗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又说什么要“联系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揭露它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这难道不是要继续捕风捉影，从政治上诬陷吴晗同志，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吗？在报上发表了那四封“组织”来的“来信”后，姚文元又“补充完善”了他的“选题”，精心地增加了十二道，声称“三十门大炮”，于第二天亲自送来报社，指令报社要按此“作主攻方向”。他特别在这份选题计划上加了按语说：“第一个战役的任务是把《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批判透，把为这个戏捧场和辩护的各种论点彻底驳掉，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请看，这种所谓的“批判透”，所谓的“彻底驳掉”，是什么“学术讨论”？这同毛

主席亲自倡导的“双百”方针，“三不主义”，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吗？没有。他们打的是“双百”方针旗号，行的是“一人作主，最后听江青的”，是根据江青的反革命意图，对学术界、艺术界进行肆无忌惮地打击和摧残的罪恶勾当。这正如他们的一个余党、当时协助姚文元炮制黑文的家伙所自供的那样：“什么学术讨论，我们要的是政治斗争”。

请看江青、张春桥一伙搞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斗争，这帮野心家又是怎样耍弄阴谋诡计，在政治上陷害广大知识分子的。

一曰“钓鱼”。

张春桥对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于是文汇报上相继发表了马捷、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郝晷衡等同志批驳姚文元文章。张春桥看了认为还不够，说是缺少知名人士的文章，还要怂恿他们“放”。于是张春桥亲自策划，由文汇报社出面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会，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澂、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教授、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前说明：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但在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致使与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有的气愤地说：“这是搞突然袭击！”躲在幕后的张春桥看到座谈记录后得意狂笑，竟说是“引蛇出洞”了。

张春桥又指使上海市委一位宣传部长亲自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说什么姚文元文章可能全部不正确，完全可以讨论。张春桥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这样一说，人家就敢讲话了。”又说：“这是钓鱼。是我叫你说的。”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人们就可以看清这个反革命阴谋达到何等毒辣，何等卑鄙的地步。

张春桥还亲自出马，在一九六六年春节联欢会上，假装“热情”地发表了一通“演说”，说什么“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还说什么“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更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甚至还怂恿说：“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如此这般，竭力地进行诱骗。请看，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表演得何等淋漓尽致。真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不愧为耍弄反革命阴谋的老手。

二曰“重新排列左中右”。

张春桥在大喊“放”的同时，指令报社把“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论点都被列入“右派言论”，发言者和文章作者均被视为“右派”，作为“狠狠打击”的对象。

张春桥一再下令“要打击右派的气焰”。他们先从打击青年学生马捷开始，组织文章围攻，同时还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历史情况，在学校内逼令他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此他被视为“反动学生”，反复挨整。他们对中老年知识分子，更是展开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翦伯赞、翁独健教授就因此而横遭迫害，翦伯赞同志备受折磨含冤而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因为讲了实话，“始终认为吴晗不是有意反党”，从此被张春桥一直骂为“老右派”，定为“坚决打击”的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害得他全身瘫痪，至今卧床不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张春桥知道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大骂道：“象李培南、姚耐这样算老共产党员，却在背后向党放冷枪，这笔账以后要算的。”从此，他们就一个个遭受残酷的迫害。再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因为在“清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张春

桥、姚文元就把他揪住不放，姚文元化名“劲松”、“伍丁”，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出黑文，什么《欢迎“破门而出”》，什么《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诬陷李平心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逼得他饮恨而死。他在去世前一个月，曾经含恨地告诉别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李平心教授这番悲愤的话，难道不是广大知识分子对江青、张春桥一伙所谓“打击右派势力”的有力控诉吗？

那么，谁是江青、张春桥发现的“左派”呢？不是别人，就是关锋和他的同伙戚本禹等人。当时窃取《红旗》杂志编委职务的关锋，读了姚文，立即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你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赞成你们这样作。”他还竭力支持说“不要怕孤立”，甚至声嘶力竭地表示：“要是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当时也连声称赞“姚文的确很好”。他看到姚文遭受强烈反对，“就为姚着急，怕他顶不住”，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还摆出极“左”的架势，阴险地提出“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形势。”这番言语，活画出戚本禹这个反革命野心家的面貌。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一些人物，马上获得了江青、张春桥的赏识。

为了集结他们的“左派”力量，江青、张春桥密令关锋、戚本禹等人悄悄来沪，面授机宜。关、戚等人一到上海，住在高级宾馆里，同姚文元多次密谈，张春桥亲自接见。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进行政治勾结。关、戚返京后，立即秘密地向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十分密切而又颇有权势的人物作了详细汇报。就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并经那个人亲自审定，关锋与戚本禹相继抛出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黑文，同姚文元相配合，对吴晗同志进行南北“围剿”。

三曰“揭盖子，大扫荡”。

“讨论”了一阵子，广大读者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来信来稿逐日减少，眼看骗局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张春桥就提出要“围城打援”，一方面揪住《海瑞罢官》和吴晗同志不放，同时向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向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全面“揭盖子”。什么“清官问题”，什么“让步政策”，什么“道德继承问题”，什么“民族英雄史可法”，什么“好皇帝朱元璋”，一个个都被“彻底扫荡”。姚文元在一篇黑文中耸人听闻地胡说：“看来，在史学界、文艺界，存在某种从繁星、吴晗到‘厉鬼’、‘清官’的统一战线。”于是大批的作品及其作者，一起横遭祸殃。正如周予同教授当时大声疾呼的那样：“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

这里必须揭露江青、张春桥一伙扫荡《海瑞上疏》的反革命阴谋。京剧《海瑞上疏》本来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同志的建议，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节目，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早两年。它与一九六一年出现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就因《上疏》也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品质，也被江青、张春桥视为“大毒草”，胡说什么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在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姚文元的黑文指名道姓作了攻击，接着，由他们的同伙、“四人帮”的一个余党，化名丁学雷，写了《〈海瑞上疏〉为谁效劳？》的黑文，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不久又化名方泽生，写了第二篇黑文《〈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他们疯狂地诬陷“《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周信芳、陶雄、许思言、蒋星煜等同志，一棍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株连到周扬同志。我国著名的麒派京剧艺术创始人、共产党员周信芳同志，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从此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一直到被折磨逼死为止。

(四)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混在共产党内的叛徒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伙对《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实行的反革命围剿，就是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妄图全面篡党夺权所作的舆论准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结成帮派，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众所周知，“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由此发迹，他们当时发现的所谓“左派”关锋、戚本禹之流，后来一个个都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黑干将，窃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高位，从而组成了所谓“以江青为核心的左派堡垒”，即反革命黑帮，而姚文元控制的写作组，后来也成了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炮队”。由于他们一伙穷凶极恶的破坏和捣乱，给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从此以后，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大肆泛滥，流毒全国。建国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被一笔勾销，光明的祖国被处处污蔑成“一片黑暗”。他们从史学界打破缺口，胡说什么“史学界有一个以吴晗、翦伯赞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有一条反革命黑线”，“遍布全国各地”。还说什么“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核心人物，还有外围人物，他们同文化部、文艺界、出版社，以及党政领导部门都有联系”。接着，上层建筑，包括党政机关，各个领域都被污蔑为“黑线专政”，到处是“三家村”、“四家店”。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部门、单位，一下子统统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从此以后，冤狱遍于全国。他们以对姚文元黑文的态度来划线，凡是不同意姚文元的人，统统被诬陷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有关《海瑞罢官》讨论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的约三千多件，作者遍及全国各个省市。内部情况反映的“不同意见”，达近百万言。“四人帮”一伙就乘机把他们加上各种罪名，进行批斗，隔离，加以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上海，张春桥一下子就把贺绿汀、周谷城、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同志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李俊民同志就是因为他知道张春桥的罪恶历史，而在《海瑞罢官》“讨论”中，又曾对“清官”问题讲过几句公正话，就被张春桥打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同志因此而遭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残酷蹂躏，许多同志被迫含冤于九泉！

从此以后，开创了“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如恶风卷地，愈演愈烈。历史，不能讲了；一讲就是“借古讽今”。皇帝，不能评了；一评就是“影射攻击”。传统戏，不能演了；一演就是“复辟倒退”。学术问题，不能讨论了；一讨论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限上纲，谁敢异议？见“洋”则忌，见“古”即反，见“名”就批。真是：“禁区”棋布，动辄得咎。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广大知识分子被专政，中外历史文化遭践踏。“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毒雾滚滚，文字狱蔓延在祖国大地上。

从此以后，谁敢讲真话，谁敢对“四人帮”他们说半个不是，就会大祸临头，轻则撤职挨斗，隔离坐牢，重则家破身亡，株连亲朋。无产阶级法制全被摧残，社会主义民主横遭践踏！代之而起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棍棒和法西斯高压，一小撮野心家乘机而起，篡党夺权。他们“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当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曾洋洋得意地叫喊：“要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十年的历史已经给这句反动口号作了最好的注解，那是一竿篡党夺权的黑旗，是一竿对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的黑旗。现在就是要把这竿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旗连根拔掉。让广大受害的人们气得以消，愤得以平，冤得以伸，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不主义”和“双百”方针在文化领域中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把他们吹嘘的神话彻底粉碎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还我中华历史真面目。讲真话，刚直不阿，有什么错？历史，为什么不能讲？历史剧为什么不能演？对历代帝王，为什么不能评论？对清官、贪官，为什么不能具体分析？今天，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四人帮”制造的冤案、“禁区”中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正怀着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和对党的无比热爱，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地奔跑。

（原载1978年12月29日《文汇报》）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兼驳《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郑 谦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只是在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江青此行，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

从1962年起，长期称病赋闲在家的江青不甘寂寞，开始出面“过问”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她一出马就不同凡响，一口咬定舞台、银幕上大量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实现她的“抱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阻力很大”。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江青的目的，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当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

江青的上海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剧）的人选。江青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海》剧，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位同志去写，但也被婉言拒绝。在上海，她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姚文元。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而且在文艺界一直以“左”的面目出现，早有“棍子”的绰号，加上不久之前对周谷城先生疾言厉色的批判，他更是与众不同。

姚文元受领任务之后，从3月初起，开始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着手写作。但他对历史、特别是明史完全是门外汉，只好找人来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关资料。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张春桥找了几个心腹参加讨论。当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将《海》剧中“退田”等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时，张、姚都莫测高深地不置一辞。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谁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1966年4月，在起草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时，康生、陈伯达授意王力等起草了一个《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在《大事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指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作者注），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这段话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似乎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中央9月工作会议之后，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指示而写的。这样，写作的时间从8月改为9月，写作的直接原因由江青的发难变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事实是，江青在1963年就已向毛泽东同